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1932 年 1 月 28 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兵分数路，向上海闸北悍然发动进攻，“一·二八事变”从此爆发。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情况下，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等和上海广大民众奋起抵抗，奏响了全国抗战悲壮雄浑的前奏曲。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已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一、蓄谋已久的侵略者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引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哗然。日本为长期占领东北，企图制造伪政权“满洲国”，因此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向国民政府施加种种压力，镇压我国人民的反日运动，转移国际视听，并进而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及排斥英美法列强在华的势力。

在此原则指导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开始在上海寻衅闹事，制造事端，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上海《民国日报》事件”，“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了。

1932 年 1 月 9 日和 21 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两条与日本有关的如实报导，因为此报在全国颇具影响，且持反日态度，故而日本侵略者趁机借题发挥。日本驻沪总领事、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多次亲自或派人去上海市府和报社进行所谓的“抗议”，他们嚣张地提出要进行“更正”、处罚负责者、保证今后各报不再有此种“不逊”行为和言论等，还发出所谓“最后警告”，如不一一照办，则将“用断然手段处置”。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舰只和陆战队大量增援上海，日军士兵不断在虹口地区实行武装巡逻，制造紧张气氛。海军陆战队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还要挟公共租界工部局，说什么工部局如果不处置上海《民国日报》，那么海军陆战队将予以封闭。1 月 26 日，迫于压力的工部局不顾报社的反对，决定“劝令”《民国日报》“自动”停刊。当天下午，工部局派出巡捕多名至报社，迫令报社员工悉数撤离，强行封闭报社门户。上海《民国日报》遂成为日军蓄意制造事端的第一个牺牲品。

与上述事件相比，“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则成为“一·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的一家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其产品因价廉物美而在竞争中压倒了日商同类产品，因此深为日商所嫉恨。“九·一八”事变后，该厂员工激于爱国热诚，不但在工厂附近积极宣传抗日，而且还组织了义勇军操练不断，这便又引起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操纵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选定了这一工厂为挑起新一轮事端的地点。

与此同时，上海滩上混迹着一伙日本日莲宗的佛教右翼派别，他们以专事暗杀活动的海军特务井上日台为领袖，组织恐怖组织“血盟团”。其弟子天崎启升等人受其委派，以“化缘”为名浪迹沪上图谋不轨。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认定这伙人有政治野心，颇可利用，于是决定利用这伙人去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寻衅肇事。另外又收买和雇佣了一批流氓打手，冒充毛巾厂工人，伺机混入人群中，貌似“反抗”地击毙肇事的天崎启升等人，以此制造流血

事件。

1932 年 1 月 18 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鬼鬼祟祟的行迹遂引起厂内义勇军注意，义勇军成员立即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此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收买和雇佣的那批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天崎启升等人用石块猛砸猛打。最后造成日僧一死二伤。打手们见日僧或死伤或逃逸，便一哄而散，将责任嫁祸于工厂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这一事件完全是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正如战后田中隆吉的自供状所言，他知道三友实业社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让和他很“亲近的女子”川岛芳子，去“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最后由于日僧一死二伤，于是他便认为“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了，随后他命令刚来上海的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袭击三友实业社。因为田中隆吉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

重藤千春果然“不负重望”，1 月 20 日凌晨 2 时许，他带领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 60 余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借着沉沉暮色偷袭三友实业社总厂。只见他们潜入厂房所在地，硫磺弹、浸油的纸团和手榴弹便飞入了厂房中，厂内顿时火光冲天，损失极为惨重。在放火焚厂之际，重藤千春及其同伙还打死前来弹压的工部局华捕 1 人，打伤 2 人。

真所谓“恶人先告状”，就在当天下午，上海日侨在日本军方的鼓动下举行千人大会，声称现在中国的抗日“暴行”已达极点，日本应立即派军“以期灭绝抗日运动”。会后，600 余日侨手持棍棒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杀尽中国人”，还用棍棒猛击中国商店的橱窗玻璃，撕毁抗日标语，强阻电车行驶，殴打值勤巡捕。一时间，上述地段鬼哭狼嚎一场混乱。

日本驻华使领机关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同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 月 19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府抗议日本和尚被杀，要求缉拿凶手。21 日，他又向上海市府再度提出所谓的“抗议”，毫无根据地咬定杀死日僧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社工人，还进一步提出正式道歉等项要求。25 日，接到日本外务省催急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再度约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指责中方“无诚意”，扬言日本政府已赋予驻沪总领事采取任何步骤之全权。

事实证明，“一·二八”事变决非几个日本特务分子所能制造出来的，它完全是日本军政当局既定的侵华政策的产物，所谓“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用以发动蓄谋已久的战争的导火线而已。

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中国当局

“九·一八”事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对日“不抵抗”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民众和一切爱国者的反对，也促使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时至“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一度由主张对日强硬的孙科派执政，然而随着孙科政府的昙花一现，由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执政的国民政府提出并实行起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与“不抵抗”政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却有若干局部的变化，其中妥协成了这一政策的基轴和灵魂。当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蓄意挑起“一·二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便始终以这一政策作为指导方针。

正如上面所言，当日本侵略者在上海频频发难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问题则持矛盾的态度。从一方面看，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且与首都南京毗邻，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容忍日军的险恶企图。因此蒋介石曾指示上海市原任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但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又非常害怕这种抵抗会导致中日全面开战，从而破坏其“安内攘外”的基本国策。因此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的意图只是要日本的挑衅和进逼不超过一“最低限度”，即武力侵占上海进而威胁其在南京的统治，而在这前提下它力求妥协退让，尽量避免冲突。

1932 年 1 月 22 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向蒋介石汇报日人在沪暴乱情形，蒋介石发言坚持其“先安内，后攘外”的一贯主张。23 日蒋介石、汪精卫还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为防止驻守上海一带的第十九路军对日开战，蒋介石还命令将第十九路军于五天之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其妥协退让的态度昭然若揭。

在上海，1 月 26 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中方在 28 日下午 6 时以前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当天下午，吴铁城会同军政部长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和张群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国民政府旋即批准吴铁城等人的上述决定。28 日下午 2 时，市府秘书长俞鸿钧用正式公函送交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全部承诺日方于 21 日提出的四项要求。

同日，上海市府下令由公安局和社会局负责取缔各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他们先后查封了设于河南路桥天后宫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设于各区的日货检查处，还要求上海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同意停止抵制日货，去掉各团体名称上的“抗日”字样。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深恐十九路军会对日军的进犯采取反击，他们对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进行了反复的“说服”。1 月 24 日，国民党要员张静江约见蔡廷锴，要他体念中央意旨，将部队撤至南翔以西，避免与日军冲突。何应钦也专程来沪，劝蔡廷锴“忍辱负重”，撤军至南翔以西。25 日晨，国民党中央委员顾孟余奉命来沪传达南京关于“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27 日何应钦正式下令，由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预定 29 日早晨完成换防工作。

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认为既然已全部答应日方的要求，又撤换了有抵抗可能的部队，与日军的正面冲突因此就可避免。但侵略者的进攻计划早已确定，这些妥协退让之举非但不能避免战争的爆发，相反进一步助长了

侵略者的气焰。同时，十九路军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民众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激励下，最终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日救亡的大旗。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更是历史的必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你们为什么不去和日本人打仗？”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上海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犹如一泻向东的浦江潮。这场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的爱国运动最终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间是上海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勃发时期，在此期间各界民众用各种方式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组织抗日义勇军，抵制日货，真所谓波澜壮阔史无前例。当日本侵略者制造“上海《民国日报》事件”、“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后，上海民众更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激愤之情。

在此期间，上海许多民众团体和行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和谈话，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的进攻。仅从1月21日到28日事变爆发这短短的一周时间中，上海市商会等团体发出了数十个通电和宣言，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和要求，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直接舆论准备。当1月28日上海市府屈辱地承认日本驻华总领事馆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后，上海市民联合会当天在新世界剧场召集全体大会，反对吴铁城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呼吁全市各界立即成立救国义勇军，积极筹款备战，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侵犯。有些抗日团体还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当局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

与此同时，驻守上海和沪宁线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正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摩拳擦掌地准备和进犯者决一死战，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无疑对他们影响极大。

十九路军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是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辖下的一支拥护革命的军队，历来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支部队虽然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反动工具，但它毕竟接受过第一次大革命洗礼，特别是在江西“剿共”战争中得到的教训，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尤其不可低估。他们亲眼目睹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与红军的鱼水关系，同时又因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而有他的难言苦衷。故而该军广大官兵，特别是一批颇具反帝爱国思想的军官强烈要求改弦更张，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是对十九路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军广大中下级军官闻听日军占领沈阳，“无一不怒发冲冠，振臂扼腕”，他们向蒋光鼐、蔡廷锴建议，都认为“剿匪徒劳无功，应转向抗日，以尽军人天职，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及光荣”，“开赴东北抗日，收复失地”。他们全体官兵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总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早已深入十九路军官兵的人心。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宁粤和议为十九路军从江西“剿匪”前线调往沪宁一带提供了契机。从1931年2月起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派与广东国民党胡汉民派公开对立，但时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双方不得不发出“共赴国难”的呼声，由于十九路军的政治领袖陈铭枢既与粤系关系深久，现又得蒋介石的信任，遂被蒋介石选为沟通宁粤双方的重要中介人物。而为了促进粤方代表前来上海参加议和，并以示笼络收买，蒋介石便决定调有着陈铭枢背景的十九路军进驻沪宁一带，作为粤方代表的安全保障。1931年9月30

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1932 年 1 月 6 日由蒋光鼐继任）。11 月 20 日十九路军抵达上海，蒋光鼐任总指挥，军长蔡廷锴，原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出任淞沪警备司令。

此时的上海滩，早已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大火炉，十九路军置身于此，其抗日热诚便更上了一层楼。据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回忆，他有一次在上海某家旅馆逗留，侍者曾责问他道：“ 你们为什么不去和日本人打仗？ ”翁照垣羞愧交加，无言以对。其他十九路军军官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以致后来不敢穿军装出门。十九路军士兵们外出购物，也常遭上海市民的冷落。这种难堪的处境更增强了官兵们的抗日要求。1931 年 12 月，刚刚抵达上海接防的蔡廷锴便开始在军中组织志愿军，准备以西南国民义勇军的名义开赴东北参加抗战。这可作为明证。

1932 年 1 月中旬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了一次又一次蓄意已久的事端，十九路军领导人便开始了军事部署。蔡廷锴听取下属军官汇报敌情后，曾拍案而起：“ 日本人欺侮我国太甚，只要蔡廷锴在上海，绝不令日人踏进我寸土！ ”1 月 15 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从其所得情报中判断，日军进犯已不可避免，于是立即就抵抗和作战问题进行了密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日军发动进攻，我军应进行抵抗。“ 我东北军过去的不抵抗，已铸成今日的大错，纵成敌人的骄横，启发国际的蔑视，中国军人的价值已毫无存留的余地，现在岂容再误！ ”这就是他们的心声。其次，他们还一致决定在该军的原来淞沪前线防地进行抵抗，并就具体要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以示抗日的决心。当得到陈铭枢和孙科主持的国民政府复电同意备战计划后，十九路军立即进行了作战准备工作。

“ 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 ”后，十九路军进一步加紧了各项战备。1 月 19 日，蒋光鼐在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召集的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战备的 6 项决定。21 日蔡廷锴拜访陈铭枢，当面请示当日军侵犯我时我军应采取如何方针，陈铭枢明确答复道：“ 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 ”23 日蒋光鼐和蔡廷锴、戴戟召集该军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作出死守上海的决定。“ 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会议还强调十九路军在物质装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应学习江西红军“ 避重就轻 ”的战术。全体与会人员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根据会议决定，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于 23 日下午 7 时向全军发布关于淞沪抗战的第一道密令：“ 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命令下达后，十九路军官兵无不情绪激昂，准备随时与日军一决雌雄。同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严正宣告：“ 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 ”，“ 我不自救，谁能救我 ”，“ 冲锋吧！让我们来高呼：杀！杀！杀！ ”这充分体现了十九路军领导人抗日御侮坚定立场。

1 月 24 日，蔡廷锴等要员抵达苏州，召集该军驻苏州的将领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了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说明了 23 日发布的第一道密令。与会将领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从而使十九路军真正做到了上下一致浑成一体的态势。

龙华会议和苏州会议之后，十九路军各部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有了比较充分的战役战术准备，至 1 月 25 日全体大体上按照 23 日的密令布置完毕。

28 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还发表了《告淞沪民众书》，表示十九路军 ” 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 ” 的决心，并进而提出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为日后军民联袂抵抗外敌入侵提出了最初的设想。

然而正当十九路军加紧备战之际，蒋介石、汪精卫和何应钦等却一再电令十九路军领导人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正如上面曾已叙述过的，他们不仅亲自出马 “ 劝说 ”，还动员社会各种势力的 “ 头面人物 ” 出面 “ 动员 ”。直到 1 月 27 日何应钦正式下令由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的防务。蔡廷锴在极不愿意的情况下勉强表示服从军令，准备移交防务，但他仍命令在宪兵第六团未接防前，十九路军仍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如日军胆敢进犯，我军为自卫计，应立即予以迎头痛击。

蓄谋已久的侵略者决不会因为对手的妥协退让而满足的。不出十九路军的预料，24 小时后，战争终于降临在上海这一中国最繁华的城市的头上。它是那么的无法避免，而对早已枕戈待旦的上海军民而言，有这一保家卫国雪洗前耻的机会，又是那么的无尚荣光和幸福！

四、“打吧！不许退走，守住原有阵线……”

1932 年 1 月 28 日，应该是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军民终于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了！

28 日下午 2 时，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出面全部答应日方的无理要求，日方表面上也“表示满意”。到了下午 4 时，迫于日方压力的工部局下令在上海租界实施戒严，这一措施为日本侵略军发动进攻提供了方便，却为中国军民进行抵抗的准备设置了障碍。

晚上 8 时半，日方眼看上海市府“圆满答复”而无可借口，于是派人提出挑战性的“声明”，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但这一“声明”直至第一声枪响起的 5 分钟前才以信函形式分别送交上海市长和市公安局长。日方之险恶用心，由此可管窥蠡测了。

到下午，十九路军预知日军进犯意图，已在各扼要路口布置防御工事，双方对峙之态势已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时至晚上，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六团到达真如，为了防止日军乘机进攻，蒋光鼐和蔡廷锴决定第二天早晨换防。

当晚 11 时，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接到戴戟电话，说据报日军有占据闸北之企图，将于晚上进攻我军。11 时 20 分时，其下属的第 6 团团长张君嵩报告说，各营官兵已各就各位，并报告说日军已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车站一带集合。翁照垣当即告诉张君嵩：“好好准备，杀敌机会快来了！”

11 时 10 分，日本陆战队一小队数十人，由便衣日探带领，由四川北路的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进占中国军队防地天通庵车站。当时车站人员均已撤走，我方在最前线警戒的只有 6 名警察，他们挡不住敌军的进犯而退却。市公安局警察第二中队闻讯赶来，也只有 60 多人，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日军占领天通庵车站后，即以此为据点发动进攻。

11 时 30 分，正当第 6 团进入阵地后不久，在寂静而又紧张的气氛中，忽然传来了一阵极清亮的步枪声，接着便是密如连珠的机关枪声，这是日军首先从天通庵车站向淞沪路沿线中国守军发出的第一枪！

此时，翁照垣旅指挥部的电话中传来了张君嵩团长急促而又略带激动的声音：“日军已开始向我们进攻了！他们由虬江路、广东路、宝山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处，用铁甲车掩护，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打吧！不许退走，守住原有阵线……”这是翁照垣旅长的命令。

伟大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揭开了战幕！

五、初战告捷的闸北保卫战

闸北是上海市区华界的一个重要地区，它与公共租界北部的虹口地区相毗邻，上海陆上交通枢纽的铁路上海总站的北站也坐落在此。另外，这里还是上海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华界市民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设在靠近闸北天通庵车站的四川北路底。因此，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张其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更竭力企图将其触角地域从虹口伸展到这块人杰地灵的区域，进占闸北自然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一·二八”当晚开战时，虽然十九路军已有所准备，但在此地敌军的兵力为我军的 3 倍，武器装备更是远远优于我军。就在这种优劣悬殊的情形下，从 1 月 28 日晚 11 时 30 分到 29 日早晨 6 时前，我军先后击退日军向闸北发起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充分表现出我十九路军官兵英勇善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杀哟！杀哟！……”当十九路军官兵第一次看到日本侵略军时，一个个眼睛都红了。只见一排手榴弹雨点般地飞了出去，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团团烟尘飞腾入空中，随后机枪一阵扫射……惊慌失措的敌军顿时死伤一片，阵地前尸骸枕藉，活着的只剩下抱头鼠窜的份了。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给十九路军官兵的初步印象是：“我们的士兵不可思议的勇敢，而敌人却出乎意料的懦怯！”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二人，在闸北宝山路奋不顾身地和敌人肉搏。他们左冲右突，见一个刺一个，刺毙约十几个敌兵后，终于殉国牺牲了，而围攻他俩的敌人是他俩的 10 倍！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击退了。

29 日凌晨 1 时半左右，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我十九路军官兵面对强敌，仍然一步不退，用手榴弹和他们对掷，用刺刀和他们相搏。不时会传来一声轰响，敌我双方士兵便都碎身于手榴弹的爆炸之下。青云路和横浜路两处路口找防御工事为敌装甲车冲毁，士兵死伤甚多，战况非常危急。此时此刻，只见我军官兵迅速登上两旁的横浜路医院大楼和光明玻璃厂楼房，居高临下据险抗击，在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敌军抛下了 100 多具尸体狼狈退却。我军恢复阵地后立即重筑防御工事，依险据守。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又被击退了。

29 日凌晨 4 时 40 分左右，日军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次进犯较前二次更为激烈，他们先是出动飞机数架猛烈轰炸我军阵地和民房，随后以铁甲车为掩护发动地面攻势。虬江路、宝山路一带战况最为激烈，由于战火弥漫无法施救，一时烈火冲天浓烟笼罩。当大火延烧至我军阵地时，火热灼伤了士兵们的肌肤，他们就用湿毛巾蒙面而坚守阵地。接着我军向日军发动进攻，冲过淞沪铁路以东地段，进入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广东街内和四川北路附近，并将靶子路（今武进路）一带敌军加以完全肃清。敌军后退至四川北路，向日本小学方向败逃。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又以失败告终了。

在这一夜的闸北保卫战中，我军官兵斗志高昂，前仆后继，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不可胜数。所谓“匹夫不可夺志”、“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用翁照垣旅长的话来讲，官兵们临阵的勇敢，“是他们自己所没有预想到的。”而日军叫嚣的 4 小时之内可完全占领上海的迷梦也永远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六、“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声枪响，全市人民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抗战的热潮，这给了十九路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坚持抵抗。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的指示精神，积极和勇敢地领导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反帝斗争。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日后曾经追忆道：“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这一群众性抗日救亡热潮中，一批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各界领袖人物也起了积极的作用。1 月 30 日上午，宋庆龄和何香凝顶风冒雪赴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英勇的抗日将士们。她们与蔡廷锴亲切交谈，表示热烈支持对日抗战。她们赞扬十九路军违命抗战，认为这样才能洗刷“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奇耻大辱。宋庆龄还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英勇作战的官兵们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2 月 12 日，宋庆龄又冒着猛烈的炮火和炸弹的危险，到一五六旅前方慰问官兵。翁照垣旅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九时许，总理夫人一行亲来前线慰劳我军将士。她们在土屋里落座时，敌机即在上空飞行。我奉陪她们巡视一周，到 11 时许方离去。当她们走过田野时，敌机一再飞过头顶，并放枪。”宋庆龄还在前沿指挥所接受战地记者的采访，她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伟大意义，盛意赞扬了翁照垣旅长。翁照垣旅长代表全旅官兵十分激动地表示：“以卫土为责之将士，决不使敌人稍肆横暴，使敌人决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与此同时，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还发动带领妇女界、医务卫生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开展了支持前线和救护济难的活动。

上海进步爱国文化界也奋起声援淞沪抗战。2 月 3 日，鲁迅、茅盾等 43 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声援十九路军抗战。2 月 7 日，巴金、丁玲等 129 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同时，陈望道等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成立了“著作者抗日会”，联合和团结了全上海赞同抗日救国的大批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成为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的抗日联盟组织。

上海工商界也热烈地参加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中来了。以上海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上海抗日救国会以积极的姿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尤其是在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 月 29 日 6 时上海市商会为抗议日军侵略上海，表示与敌不共戴天的决心，发出了紧急通告，命令全市商店“一律罢市御侮”。1 月 31 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和工商界领袖虞洽卿等 32 人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旨在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史量才在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奴，死不作亡国鬼。现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持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史量才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不久，2 月 18 日，上海地方维持会与上海市总工会等 81 个民众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得更为广泛了。

淞沪抗战的消息一经传开，全国各地便掀起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高潮。南京、北平等城市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十九路军，他们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何如迎头痛击。”各地许多学生、工人、职员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奔赴上海，直接参加战地工作。各地民众还踊跃捐募金钱、物品、药物和军用工具，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和参加捐募的各阶层人士之广泛，都是史无前例的。总之，“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七、“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

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的消息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上层军政要员中主张抗日的也纷纷起来要求一致对外抗日。

1月29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等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31日，孙科等19人又致电何应钦，抨击蒋介石政府对淞沪抗战不加援助。2月14日，国民党内粤派领袖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指出在日军未退出上海之前，政府无交涉可言，他还致电十九路军表示敬意。1月31日，唐绍仪等26位国民党要员也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表示敬慰之意，另寄40万元汇款以示支持。

在全国朝野一片主张抗战的呼声中，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日本进攻上海的行动也深感忧虑。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深为震惊地写道：“闻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军，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国民政府终于转到了在上海实行抵抗的立场上来了。1月29日，蒋介石确立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同时他还制订了应付淞沪战争的《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从军事上作出了进行抵抗的初步计划。

就在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以示政府长期抗战的决心，另外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主持工作。会后蒋介石发出《告全国将士电》，这一声明虽然含有不少属于表面价值的成分，但显然同“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的态度有所不同，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他决心抵抗的态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不得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作出有限度的局部抵抗，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战争的扩大，试图通过积极的交涉活动，尽量争取到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以实现妥协停战。

而在国民党军队中，要求抗日的呼声也正一浪高似一浪。从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到2月20日前后，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公开发表通电，一方面对十九路军的抗战表示声援，另一方面则要求开赴前线直接参战。这些抗战呼声不但来自国民党军队中的地方部队和桂系、粤系、湘系等部队，而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江西“剿匪”前线的部队也发出了要求开赴抗日前线的呼吁。

就在蒋介石黄埔系嫡系部队中，抗日潮流也在兴起。陆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系中央军的精锐之师，可谓蒋介石的“御林军”。当淞沪抗战爆发后，两师官兵群情激奋，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深表同情，他们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1月30日下午，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前往南京军政部面见何应钦，代表全旅陈述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但遭到了何应钦的拒绝。当天晚上，宋希濂又率全旅营级以上军官30余人向何应钦再度提出抗日的要求，直到深夜1时多方返回营地。2月1日，驻守杭州的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带领全师开赴上海参战。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为黄埔系的重要将领，他对国民政府按兵不援十九路军的做法极为不满。2月初他在浦口与蒋介石见面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

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迫于国内外的形势，蒋介石最终于 2 月 14 日颁布命令，将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直接赴上海参战，它成为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的最重大举措。

八、击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正当国内外抗日高潮风起云涌之时，淞沪抗战战场上的形势也变幻多端。日军在 1 月 28 日深夜发动全面进攻后，在闸北保卫战和相继爆发的北火车站保卫战中并没有得手，就是在 1 月 29 日和 31 日先后两次由英美居间调停的暂时停火期间发动的小规模进攻也损失惨重。2 月 2 日起，日军第一次向淞沪增兵，2 月 4 日开始了第一次总攻。这次总攻分别是在吴淞和闸北两地展开的。

吴淞要塞位于长江与黄浦江的汇合处，呈一三面环水的突出部，要塞炮台就设在这个突出部上。日军增援部队要在上海北面的长江沿岸登陆或进入黄浦江再行上陆，都必须通过这里才能实现。于是吴淞要塞便成为日军进攻的战略要地。

2 月 3 日日军曾对吴淞要塞发起过一次未遂进攻，4 日 11 时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便又开始了。黄浦江上驶来的 13 艘军舰和 24 架飞临上空的飞机进行了轮番轰炸，我驻军以迫击炮、机关枪相迎，一时间炮声隆隆不绝，江中的波浪水花四起，地上的烟尘泥灰纷飞。炮台守备营官兵伤亡惨重，无法在炮台继续支持下去而溃散了。面对日军企图乘机登陆占领炮台阵地，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下令死守，竭力制止敌军的登陆。战至下午 5 时，敌军终于放弃了登陆企图。随后在 5 日的日军轰炸后，日本海军的兵舰始终只能在长江和黄浦江上巡弋而最终难圆其登陆的美梦。

在闸北方面，2 月 4 日上午 7 时许日军向我军阵地发起总攻，只见宝山路、天通庵路一带火光冲天，工事及房屋连连被毁。我军奋勇还击，双方血肉相搏，死伤甚大，尤其天通庵路一带我军的守兵大部牺牲，阵地一度被敌攻占，但不久又为我军恢复。2 月 5 日凌晨敌军又继续发动攻势，其势头较昨日更为猛烈，但时至下午各路进攻均为我军所击退。对这天的惨败，公然为日军侵略行径张目的日文报纸《每日新闻》也不得不发出阵阵哀叹：“ 5 日晨我军（指日军，下同）决行总攻击以来，为空前未有之大激战，敌军（指中国军队，下同）死力反抗，我军虽猛烈发炮，然彼竟东冲西扑，致我军不易进展。未几敌军以迫击炮袭击我军，致我军惨遭未曾有之惨败。 ”

2 月 6 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继盐泽幸一为淞沪战场最高指挥官，这显示出日军的第一次总攻以失败告终了。

九、中国空军也参战了

在淞沪抗战开始之初，日军便始终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这对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我空军力量过小，南京军政部起初并不打算动员空军参战，但因十九路军催促甚紧，最终决定调动空军参战。

2 月 5 日空军将领黄秉衡等 11 人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御侮、血战到底的决心。2 月 5 日、22 日、26 日中国空军直接与日军进行了空战，从此开启了中国空军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先河。

2 月 5 日之空战系攻击战。当时中午日军 4 架飞机袭击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的真如，我军 4 架战机旋升空近敌，日机“ 凤翔 ”号被击中弹 1 发。我空军第六队副队长黄毓全不幸阵亡，成为中国空军在淞沪抗战中作战阵亡的第一人。

2 月 22 日之空战系遭遇战。那天我军战机由南京出发飞往杭州，美籍飞行员萧特（Robert Short）驾机同时飞出，当时他驾驶的“ 波音 ”单座战机全无通讯及导航设备，与其他飞机失去了联系。下午 4 时 20 分当萧特飞抵苏州上空时，与轰炸苏州的 6 架敌机发生遭遇战。面对强敌萧特毫无畏惧，与优势敌人展开激烈空战，日军一机长中弹当场死去，另一机枪手中弹受伤，日机 1 架被击落。最后萧特的飞机不幸被 1 架日机击中，飞机坠毁于苏州附近，萧特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上海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征得他母亲的同意后，将他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2 月 26 日之空战系防卫战。上午 7 时许，15 架日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我军虽是仓促应战，但石邦藩、赵普明等驾驶员奋勇迎战。在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中，两架日机被我机击中水箱而被逼迫降，并使日军歼灭我空军主力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国空军参加淞沪抗战虽然战果不大，而且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但对于推动和激励抗日御侮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空军官兵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尤其令人感佩之至，而美国飞行员萧特也是虽死犹荣，重于泰山。

十、庙行大捷

日军对淞沪的攻势并没有因为第一次总攻的失败而结束，相反，当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辛一为淞沪战争最高指挥官后，日军变本加厉地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

野村吉三郎 2 月 7 日、8 日正面进攻吴淞失败后，13 日改为从蕴藻浜南岸进行偷渡，进占曹家桥一带向我军右翼迂回进攻，但亦以失败告终。此时日军利用英美等国调停企图迫使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同时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准备发起第二次总攻。

日军此次的进攻计划是实行“中间突破”，即从闸北到吴淞进行全线攻击，以牵制中国军队的兵力，其主力则集中指向江湾、庙行，妄图首先占领这两个战略要点，切断第十九路军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军之间的联系，随后再各个击破。2 月 20 日早晨 7 时，日军悍然发起了第二次总攻。面对日军此次总攻，早有预料的我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首次并肩作战，共同抗敌，进行了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在闸北、江湾、庙行、蕴藻浜、吴淞、浏河等战线进行了全线抗击，其中以庙行之战最为著名。

21 日晚 8 时 30 分，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下达了次日重点进攻庙行地区的进攻命令。而我军在庙行一带前线的第八十八师约有 3 团的兵力，张治中和俞济时分别在军部和师部亲自指挥庙行之战。

22 日凌晨 1 时起，敌第九师团主力约 2 万人乘着黑夜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来势极为凶猛。我军奋勇抗击，步枪、手榴弹、机关枪互相轰击投掷，战场上杀声交织，血肉横飞。至 5 时左右，竹园墩、庙行一带阵地遭敌军火炮射击已不下三四千发，所有阵地多被摧毁。敌军乘大雾弥漫的拂晓之际，以纵深重叠配备，向我军阵地节节进逼，战斗愈加猛烈。我军殊死抗击，敌军反复冲锋，双方展开拉锯战。天亮之后，敌军飞机、大炮轰击越发猛烈，我军伤亡惨重，麦家宅阵线被敌军突破。至此庙行前线战况十分危险。

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接获庙行前线战况后，当即采取紧急措施。张治中军长亲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赴八十八师指挥部策应，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由火烧场向庙行镇增援，二六一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击敌军之侧背，俞济时师长则率部对敌军突入区施行反攻。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也于当天上午 9 时部署了从江湾至蕴藻浜及正面三方同时出击的作战计划。

俞济时师长亲自率队进入前线督战后，师部所有的预备队和工兵营等悉数投入了战斗，阻敌于严家桥等一线，与麦家宅方面攻来之敌军形成相持局面。血战至当天中午，敌军兵力用完，已无法扩大战果，而我军因增援部队已到，士气渐稳，阵线复趋稳定。同时，蔡廷锴军长下令六十一师 2 个团从侧部予以进攻，我军士气益盛。午后 12 时 30 分，敌军因庙行之南无力再发起攻势，遂在庙行镇至周巷一线增兵千余人，配合以飞机大炮的猛轰，几近孤注一掷地企图突破该线，从而包围庙行夺取之。

22 日下午，庙行激烈的形势迅速向着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和六十一师 3 支劲旅不断向敌军进逼，逐步形成三面包围进犯庙行来敌的战局，迫使敌军开始步步败退。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先头部队已开始从侧背向敌军发起进攻，并逐渐向南挺进包抄。同时，守卫庙行的部队从正面向蔡家宅方向的敌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攻，敌军被迫节节后撤。下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